

《内藤湖南の世界》评介

胡宝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2001年3月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出版了《内藤湖南の世界》。这本书是由附属该所的“内藤湖南研究会（以下略记为‘研究会’）”的诸位成员集体执笔撰写而成的，挂帅人物为该所的主任研究员、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道雄先生。研究会是1996年在谷川道雄、山田伸吾两位先生的倡议下成立的，其目的正如谷川在该书前言中指出的那样：“除去参加者对内藤先生的学问怀有深厚的敬意以外，通过研读内藤的著作去领会那些与当前学界思潮具有本质上不同的观点及方法，从而更进一步走进内藤湖南的世界，也是与会者的一个共识。特别是战后的五十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缺乏一种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史发展的理论。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回到内藤湖南的研究体系上，则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就好像在山中迷失方向的人那样，最终只能沿着来的路线退回到始点。”研究会每月定期举行一次活动，与会者一起研读内藤湖南的代表著作并展开讨论。这本书就是在研究会成立后的四年中，在39次的学术活动基础上产生的。

全书共三百九十六页，由十二章组成。其中谷川在序言中对内藤湖南的生涯以及思维特点进行了介绍。文章指出战后的日本学界，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传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内藤的关于文化史的学问方法也因此受到了冷淡。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曾经作为金科玉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在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中占有的比重日益缩小，而能够取而代之的新的方法论还没有问世。现在的历史研究课题大多集中在个别实证的水平上。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内藤的包括现代中国论在内的史学理论体系，从日本近代学问的源流开始，重新创建我们的自身学问。文章中还介绍了内藤对大学应该坚持纯学术研究方向的观点。早在1901年8月，内藤曾先后三次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文章，阐述了关于京都大学设置文科的看法。他认为由于东京大学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导致了东大的学术环境具有不透明性。因此，远离政权的京都大学应该成为一所不求名利、致力于纯粹学问研究的大学。内藤的这一主张对日后京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小野泰在《内藤湖南和他的时代》一章中，围绕内藤的青年时代即明治维新后的三十年，日本国内处于近代国家形成的上升时期，分析考察了对内藤思想形成给予影响的社会诸因素。针对福泽谕吉等人主张在西洋的新文明与东洋的旧文明的冲突中，日本应该“脱亚入欧”的论点，内藤则提倡日本应该扬弃东西方文明中的对立部分，建立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内藤初期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世界文化的建设；2、日本的指导性；3、中国文化的发展性。这些思想观点实际上贯穿了内藤的一生。内藤认为中国的问题也是日本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文化未来的问题。辛亥革命后，内藤在《支那论》一书中开始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特别是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对此，山田

伸吾的《内藤湖南与辛亥革命》文章做了论述。文章指出，辛亥革命后，日本新闻媒体的基调是辛亥革命是落后的中国为了追上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必然途径。内藤则认为这场革命不是西欧的近代革命，而是中国历史独自发展到近代的必然过程。这是相对西欧模式近代的另外一个近代社会，而西欧与日本的近代最终要与此合流。这是内藤对世界史未来的一个代表观点。吉尾宽的《内藤湖南的中国共和制论》考察了内藤在撰写《支那论》与《新支那论》十年间对中国认识的变化过程。辛亥革命后，内藤期待的共和制国家的建设一直没有发展，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国际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急剧扩大。这些对于中国共和制的建立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这个时期的内藤思想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重视中国社会基层力量的变化。他在《支那论》中，把实现中国共和制的原动力投向地方社会上具有号召力的长老阶层，在《新支那论》中则把实现共和制的期望寄托在农民的富裕化上。内藤期望的农民是具有一定儒家传统文化的，他认为这是实现共和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否定儒教就等于否定地方自治的基础，从而否定了共和制成立的根本原理。山田神吾的《内藤湖南与满洲帝国》，对现实主义的內藤湖南与理想主义的桔朴进行了比较。桔朴的思想核心是把西欧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在一起，在满洲国实现农村民主主义。桔朴一生都在关心着中国的发展。桔朴在政治上主张实现“非资本主义的职业自治国家”，消灭地主、资本家等“不劳而获阶级”，实现农民、劳动者、具有知识修养的工薪阶层在平等基础上的自治。内藤则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构想出由满洲人的自治完成满洲国建设发展的途径。二者都承认满洲国建立的既成事实，但是反对作为日本傀儡政权的存在方式。葭森健介的《内藤湖南与京都文化史学》叙述了内藤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及其与日本史时代区分论之间的关系。葭森认为内藤的学问首先是在对日本文化史的若干认识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内藤的中国史时代区分即是在日本史的研究前提下形成与展开的。内藤分别把日本的镰仓、江户时代，奈良、平安时代与中国的宋代、隋唐时代的类似之处进行了比较，指出明治前庶民的江户文化属于日本的近世文化，平安时代是一种贵族文化。而对平安贵族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隋唐文化也应该具有同样的特征。此外，葭森还指出日本的明治末期到大正年间，在京都开创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是从事日本经济史的内田银藏、西洋史的原胜朗、东洋史的内藤湖南。这些学者之所以建树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与他们彼此间的交流及对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不可分割的。作者认为在今天历史学研究领域日益缩小、研究题目日益细化、有影响的成果很难推出的环境下，内藤时代的这种跨学科的交流以及关注现实社会的热情都是现代学者应该努力学习的。福原启郎在《内藤湖南中世贵族形成的思考方式》一文分析了内藤从学问与礼教的角度论证六朝贵族在文化上的特征及形成的过程。战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主要侧重政治与社会方面的研究，但是，文化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课题。福原的研究就是在这个方面作出的努力。福原通过对内藤《支那中古の文化》的分析，指出从文化方面寻找中世贵族成立的根源，更接近历史的原貌。小林义广在《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论与人物论》一文中，对战后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侧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倾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重点介绍了内藤通过描写那些体现时代特征的人物来叙

述历史发展的研究方法，指出内藤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去把握中国各个时代的历史特征的。高木智见在《内藤湖南的历史认识及其背景》一文中，对内藤的历史认识论的形成进行了分析。高木认为内藤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主要来源于认识方法。内藤用一种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历史发展，把一切都放在一个变化过程中来考察。这是内藤认识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内藤的这一历史认识观的形成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影响有关。一个是《史记》所体现出的历史变化思想，一个是佛教的诸行无常思想。马彪在《内藤史学与清朝史论“大势论”》中，通过对《支那史学史》、《清朝史通论》等著作的详细考察，介绍了内藤对清朝史学的评价及清朝史学成果对内藤的影响。内藤曾把顾炎武、顾祖禹、章学诚等人对清朝的历史认识与主张称之为“大势论”。“大势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它们不是用什么主观的价值观来解释历史，而是把历史看作是人类社会本身自然的变迁过程。这一点对内藤的历史认识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内藤主要接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影响。一是明末以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对现实政策提出的经世论观点，内藤称其为“时势论”。二是明末清初以来至乾隆时代有关汉字的历史理论、顾炎武关于制度史的论述以及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等成果，内藤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赞赏。认为对历史沿革的探求也是一种考察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史学理论。三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内藤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史学原则、原理、原论、源流的“学问论”。内藤正是从这些清朝史学思想中吸取了丰富的养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认识观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内藤的《支那论》可以说是《时势论》的翻版，而《支那上古史》、《支那近世史》等著作也都明显的具有《沿革论》的特色。

内藤认为历史就是文化发展史，史学的核心是文化。大谷敏夫在《内藤湖南的中国文化论与政治论》一文中对此作了专门介绍。作者通过考察近代历史的发展，介绍了内藤文化论与政治论的关系。在内藤的文化论中，文明与文化的价值是不同的。内藤的文明观中不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它是一种纯粹的由文艺、艺术等组成的文化，它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内藤文明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不是追随欧美的物质文明，他重视的是中国独自的文化生活中所反映出的价值。而养育与保护这种文明是国家政府应有的责任。内藤的政治论就是从这个角度上产生的。内藤所期待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国家，归根到底是一个能够保证人民高度的文化生活的国家。

战后的日本学者针对内藤的史学思想与观点发表了许多评价。其中包括一些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对内藤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正当的观点进行的批判。如野原四郎《内藤湖南“支那论”批判》，（《アジアの歴史と思想》弘文堂 1966 年）；五井直弘《近代日本与东洋史学》第二章“日本与中国文化论”，（青木书店 1976 年）等论著。增渊龙夫所撰《关于历史学家同时代的考察》（岩波書店 1983 年）从内藤思想的内在原因探讨了关于侵略中国正当化观点的形成过程，增渊的批判在日本学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增渊批判内藤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文化中心移动论。二、日本经济侵略的正当化。内藤认为中国文化是孕育日本文化的母体，日本文化的发展只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洋文化一部分的发展。即日中两国的文化是来源于一个母体的文化。内藤的文化中心移动论就是在这个认识上形成的，

并由此产生了近代日本应该对中国的发展发挥作用的设想。内藤认为东洋文化的发展问题，不在于追溯那些创造和传承各自文化的民族的关系，而应该考虑一种打破民族界限，最终形成一个东洋文化的途径。他还提出文化的发展不是各自民族自己发展的过程，它是超越民族差别的空间，根据文化中心地的移动而完成的传承与融合。内藤发表这些看法时，正值中国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日益高涨时期。增渊认为内藤的文化史观为日本的经济侵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还批判了内藤轻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观点。针对上述批判观点，谷川道雄在《内藤湖南的世界》一书的最后，专门撰写了《关于战后的内藤湖南批判》一文，陈述了下述反对意见。首先，谷川指出在日清战争前后日本国内盛行“天职论”的时期，内藤撰文写道：“作为日本的天职，决不是向中国传播欧洲的文明，也不是向西洋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自身具有东洋文化的传统，又吸取了欧洲的文明，应该发挥日本的新理论，创立新学说，在此基础上表现出东方学术的特色来。”这是内藤针对福泽谕吉鼓吹的以欧洲文明指导亚洲的所谓启蒙主义天职论的批判观点。内藤的这个观点并没有要脱离汉学基础的意思。内藤高度评价了顾炎武以来的清朝考证学，激烈的批评了日本旧来的汉学所具有的狭隘与浅薄。内藤所赞许的考证学不是那些循规守矩、琐碎的考证。内藤所赞赏所看重的是像章学诚那样的学者，他们超越了一般的考证，具有贯通古今的独到见识。

谷川还指出增渊对内藤的批判有误解的地方，否认了增渊认为内藤对于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派活动持轻视的态度、内藤期待清朝立宪政治不重视革命力量的发展等说法。谷川指出，内藤在辛亥革命爆发几个月前做了题为“清国的立宪政治”的讲演。内藤对当时的立宪运动成功与否，持悲观的态度。内藤认为清朝政府虽然要在五年后设立国会，但是中国的现状缺乏一个维持立宪政治的中产阶级。在这种形势下即便成立了国会，民主思想、官民平等的思想也不会得到任何体现。谷川还举出内藤曾在1911年11月24日到12月8日期间，连续三次作了“清朝的过去与未来”的讲演。其中，内藤在武昌起义两个月后的一次演说中说：“预测中国的将来，无论是满洲朝廷的复兴，还是袁世凯依靠欺骗统一中国、或者由革命军建立共和制国家等等，都是很难困难的、也是无益的。但是最后革命主义、革命思想取得成功是毫无疑问的。”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内藤表示：“我们同情失败的革命党人。他们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国民性，所以使革命的成果付之东流。”内藤认为革命党没有争取中国最有生命力、最具共同生存理念的团体、即宗族与乡党的支持，所以导致革命失败。据此，谷川认为增渊批判内藤轻视革命派的观点，是一种偏颇的皮相之谈。此外，增渊还批判内藤认为中国民众抵制日货运动是“把自己推向绝境”的愚蠢行为。那么，内藤上述言论的真实意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谷川指出：内藤认为抵制日货的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民族主义表现，实际上运动的背后是那些与督军勾结在一起的买办商人为了防止日本商品流入中国国内。内藤认为日中间的商业交易活动，可以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种经济的活力，促进地方社会民主化的发展。内藤还设想中国农民随着谷物出口的解禁可以增加经济上的收入，并因此从根本上加强民众的力量，巩固共和制国家的基础。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媒介，内藤期望日本经济能够给中国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另外，从东亚历史发展来看，对于已经呈现出衰弱状态的中国来说，由周边曾经接受过中国文化影响的民族来帮助，是恢复元气的重要一环。内藤从五胡十六国以来，举例说明了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中国古代王朝的振兴过程中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指出当前日本经济对中国的输入行为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但是，历史上的外来民族势力的到来，在中国人看来几乎都是一种暴虐的政治行为，而今天的外来势力则完全不同，它是以一种经济的、和平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中国与周边民族之间如此的相互作用，是内藤文化中心移动说的核心思想。内藤对日本在中国进行的经济活动发展所期待的是：它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华民族出现新的转机，使中国农民富裕起来，成为新文化的承担者。这些都是内藤渴望实现的梦想。

关于增渊批判内藤主张由列强对中国进行国际管理的观点，谷川介绍了内藤在《支那论》自序中的如下观点：

我现在完全是从中国人的角度，为了中国的考虑，写下了这部书。可是，像现在这样的状况，这种为了中国而考虑的必要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不再需要了。北清事变之际，天津曾经出现了都统衙门，实行的是由列国组成的联合政治。而第二次更大的都统政治出现的时机也不会太远了。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民族，也是一个统一的民族，现在世界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与权利均处在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之中。所以，连他们自己也承认迅速的将中国分割掉是不可能的。但是，上述的都统政治方式却是一种到什么时候都可以顺利实施的。所以，如果都统政治可以抛开“国民独立体面”的主张的话，中国人就有可能因此转入一种理想的生存环境。

谷川根据上述记载认为，内藤并不是从开始即主张在中国实行国际管理的。内藤认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是在把中国拖向黑暗的深渊，是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所以，在这样的严峻关头，如果能够扔掉“独立的体面”，利用国际管理的方式也许会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得安定一些。当时，内藤最大的忧虑在于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如果因此导致日本政府的正面对抗，日中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有鉴于此，内藤产生了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国际管理的方式解决当时困难局面的设想。总之，内藤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安定。谷川认为把内藤看作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代言人是恰当的。

内藤湖南是一位逝后留下 14 卷全集、被日本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称之为“博览强记、精通经学、词章、书画鉴赏”，比作王应麟的著名历史学家。今年是内藤先生逝世 70 周年，但是他的史学观、史学思想以及历史研究方法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远去。内藤史学的方法论对于 21 世纪的史学研究仍然具有积极的作用。谷川曾经说“我每逢在研究中碰到困难，就必然要向前辈宗师的业绩中寻找答案。”（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上“致中国读者”，夏应元选编并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这种重视学术传承、执著的追求学术真理的精神，是日本学界固有的一种优良学风。周一良先生曾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序言”中说：“他们遵守乾嘉朴学大师的教导，读书必先识字。在大学的史料演习课上，必须要弄清每一个字的含义。治少数民族史者，必须能了解其语言文字。研究佛教史者，多通晓藏文梵文。”内藤湖南研究会成立后的近 40 次学术活动和《内藤

湖南的世界》一书的出版，就是这种“叫真儿”的学术环境下的必然产物。这部著作作为我们研究与了解内藤湖南的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了解近代中日学术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收稿日期：2005-01-30

作者简介：胡宝华（1954-），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